



西方的中国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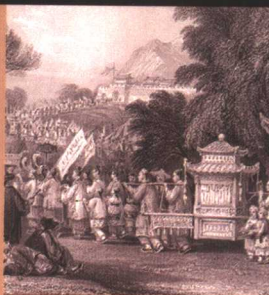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中国乡村生活

VILLAGE LIFE IN CHINA

〔美〕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著

陈午晴 唐军 译



中华书局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中国乡村生活

VILLAGE LIFE IN CHINA

〔美〕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著

陈午晴 唐军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乡村生活/(美)明恩溥著:陈午晴,唐军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西方的中国形象/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ISBN 7-101-05163-4

I. 中… II. ①明…②陈…③唐… III. 乡村 -
社会生活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D4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356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乡村生活 |
| 书名原文 | Village Life in China |
| 著 者 | 〔美〕明恩溥 |
| 译 者 | 陈午晴 唐 军 |
| 丛 书 名 | 西方的中国形象 |
| 主 编 | 黄兴涛 杨念群 |
| 责任编辑 | 马 燕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7 千字 |
| 印 数 | 1 - 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163-4/K · 2283 |
| 定 价 | 20.00 元 |
-

“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

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里,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

“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

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不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

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7年至1999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三至五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著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

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本书基于这样一个立场：作者在中国有过丰富的生活经历之后，对中国人无数的优秀品质深表尊重，并对大多数中国人怀有强烈的个人敬意。中华民族不仅有着举世无双的过去，也必将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美好的未来实现之前，还存在许多必须克服的缺陷。一个人愈是了解中国，愈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贸易、外交、政治关系的扩展，以及与西方文明的接触，都不足以达到中国需要的这种改革。

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我们不能过于重申中国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断言总是暗含着这样一种局限：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另一方面，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思潮中被广泛议论，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可能性表明，这个帝国在 20 世纪开端将不会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应当说，任何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作品都会增进人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本书的完稿，即是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粗陋的贡献。

明恩溥

目 录

中国乡村生活

前言	1
01 中国乡村	1
02 乡村结构	6
03 乡村名称	15
04 乡村道路	19
05 乡村渡口	23
06 乡村水井	27
07 乡村商店	31
08 乡村戏剧	35
09 乡村学堂和游方书生	48
10 中国科举制度及教育改革	81
11 乡村庙宇和宗教团体	102
12 宗教仪式的协作	107
13 市场及集会的协作	111
14 协作的贷款团体	116
15 看护农作物的团体	124
16 乡村和城市求雨	131
17 乡村狩猎	135
18 乡村婚礼和葬礼	140
19 乡村新年	154

20	乡村地痞·····	167
21	乡村头面人物·····	178
22	乡村男孩和成年男子·····	186
23	乡村女孩和成年妇女·····	203
24	乡村生活的单调和贫乏·····	245
25	中国家庭不牢靠的平衡·····	250
26	家庭的不稳定性·····	255
27	基督教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	268

01 / 中国乡村

单单一个印度,就有五十多万个乡村。而在整个亚洲,乡村的数量则或许是这个数字的四倍。至今为止,在这个地球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大部分人都住在乡村。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国游人,如果从某个港口如天津出发,一直沿着同一个大致的方向旅行,大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其版图的另一边沿。在这次旅行中,住在城市中心之外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必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也只有亲眼目睹的人才能获得。与西方人流行的观念相反,相对全部人口来说,中国大城市的数量并没有西方那样多。许多地区级的城市、县首府,只不过是一些带有围墙和衙门当局的大乡村。众所周知,印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农村。而在中国,我们或许没有理由认为住在农村的人口数量会少于这个比例。

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旅行中,不熟悉中国的外国游人一直会这样自问:这些不计其数的人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其内容和范围是什么?

像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不经充分解释,则无法得到明智的回答。中国人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完全不同于那些我们已经习

惯了的环境和条件。任何想当然的看法都是不可靠的。在某些基本的一致性当中,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迷幻和令人费解的多样性。无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已经居住了多久,总是有许多事情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而这些事情又被认为是每个人凭直觉已经知道的。即使国外来的资格最老的居住者,也与其他国外来的居住者一样,是一个学生。

这种状况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必然产生的结果,而且它以宏大的规模来达成其效果。正如柯库侯姆(A. R. Colquhoun)先生所洞察的那样:“由无数的累积持续导致的产物一定是巨大的,如果再加上第三个因素,即隔离,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文明的复杂特性和奇特的保守形式感到任何的惊奇。”^①基于这个理由,我们认为对中国人的生活现象进行连贯而又有序的解释几乎是没有任何指望的。这就需要将所有在中国的长期居住者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使其完整起来。当然,这种协调将是几辈子的工作,其最终作品将充满整个伯德莱恩(Bodleian)图书馆。为了扩展我们关于这个海洋般广阔的主题的知识,唯一的实践途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详细考察所有进入到我们视野中的这种现象。诚然,没有两个人会有同一个视野,也没有哪个视野会固定于同一个范围之内。

应当说,要观察一个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一个上好的方法就是揭开其屋顶,不过,其前提是不能干扰房子里的人。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人,就必须揭开他们的屋顶,去了解房子里

① 一个关于中华帝国在世纪末正在经历重大危机的思考,没有归入本书。任何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人都应该专心地参阅A. R. 柯库侯姆先生的大作《转变中的中国》,伦敦和纽约,1898。该书体现了一个颇有造诣的旅行家以及一个富有经验的东方国家行政官员的成熟信念,而且是通过第一手的资料来了解中国。

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这对于外国人来说,难于上青天。不过,他可以模仿中国人,将一个湿手指放在纸窗户上,使得纸窗户上留下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至少能够观察到某些东西。虽然本书由一些既不同质又不太连贯而且相当不精致的章节组成,但是,这些章节都是关于中国人实际生活现象的研究,对这些现象的观察,即有赖于上述“窥洞”。

来到中国的外国游人经常被无数的城镇和小村庄环绕着,他自然想知道所经过的地区有关人口的一般情况。不过,如果他贸然地询问某人关于某城镇或其所辖区的人数,那么,他得到的回答无非是“不少”或“谁知道”。差不多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能大致说出他所在的县里有多少个村庄,至于哪个村庄大哪个村庄小,则不一定清楚了。而且,中国人与其他的东方人一样,绝对不在意什么统计数字,他们对于平均意义上的东西只有最初始的观念。中国人根本不懂得统计数字所反映出来的含义。

显然,我们也不能完全信赖中国官方的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却是我们进行理性判断时能够依据的唯一基础,因此,它们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现在我们意识到,要获取每平方英里上真实的人口资料,一般得从大单位如省,至少是府,开始着手,其基础和上层结构就像是有待猜测的宝塔构造。

几年前,我们在一个县里以一个很有限的区域作为测量单位,对其人口进行了一次比较准确的计算。我们以国外居住者为中心,取一个半径为 20 华里的圆圈,在这个圆圈内对每个乡村于 1878 年受到饥荒救济的情况制定一个表,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对家庭的平均数作出一个近似的推测。其结果是,总共有 150 个乡村,以每家 5 人计算,乡村的平均规模是 80 个

家庭,该区域内总人口为6万人。由于20华里等于6英里,因此,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就是531人,约等于比利时王国(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的人口密度,该国于1890年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534人。

在这个圆圈之外几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称作“十三村”的地带,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就是因为在其5华里的距离内正好有13个乡村!这表明,在特殊的地区内,上述人口推测的方式是不适宜的。由于黄河的老河床吞噬了广袤的陆地,该地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没有乡村而被废弃了。还有一条从大运河导向大海的水道和一长条大大低于一般平均地势的洼地,由于这里经常发生洪水泛滥,所以很少有村庄。

既然存在这样一些原因,我们当然需要在一个适宜的地点重新进行测量。我们重新选择的县属于临清(音译——译者注)府的某个县,位于该州府东面90华里的地方。这个区域只有前面那个选点的一半大。我们这次去不仅仅是测量乡村的平均人口数,而是计算每个乡村目前的实际家庭数,本地人是知道这个数字的。当地中心地带某乡村的一个本地人为我们准备了区域内的乡村地图。这个人颇有见识,他将每种情况下的人口估算都略为降低于一般的推测值,从而保证了我们的推测不超过实际的范围。他指出,一个家庭的人数仍然以5个人计算是完全不恰当的。许多单一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并共同拥有所有的物什,他们因此而被计为一个联合的家庭,而实际上这个家庭可能有20个人。在外国游人看来,这个地区的乡村似乎不仅规模大,而且密实地串在一起,事实上,统计细目确实显示了这种情况。在一个半径为10华里(3英里)的圆圈内,有64个乡村,最小的乡村有30个家庭,最大的乡村有1000多个家庭,

平均每个乡村有 188 个家庭,家庭的总数是 12040 个,以每个家庭 5 人计算,整个区域内人口总数是 60200 人。因此,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 2129 人。

显然,在直隶(相当于今河北省——译者注)的南部和中部、山东的西部和西南部、河南的北部这三地,有着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儿的乡村和上面那个地带一样稠密,因此,我们同样只能近似地估测其人口的状况。不过,就中国北部整个平原而言,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进行推测:人口稀疏的县,其人口密度大致是每平方英里 300 人;人口稠密的县,其人口密度大致是 1000 到 1500 百人。无论如何,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巨大的人口拥挤在这些肥沃而有历史意义的平原上,同时,要想得到真实的“人口普查”资料,确实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